

中国电影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景观

○ 于晓风 余晓琪

摘要：生态女性主义注重情感体验，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双向互动，通过批判二元对立凸显意义与价值，旨在努力寻求主体自身的深度清醒、多元立场的了解认同和差异观念的最大包容。近十年来的中国电影努力尝试对于生态女性主义的双向互动，以及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关系变化、方法调试和认知发展进行各个维度的多元呈现，借助自我感知和他者认同两条进路，勾勒出女性视角下情感强度的上升曲线。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双向互动 情感强度 中国电影

关于女性话语和女性力量的思考自人类社会步入现代文明起就从未缺席。生态文明时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召之下，“女性是一束光”的呼声以个体生命呼应群体力量，再度引发当代中国对女性自我书写与自我表达的普遍关注。^[1]纪录片《人间世》(Ren Jian Shi, 2016, 周全)、《生门》(Welcome to the World, 2016, 陈为军)对“中国式产房”的呈现印证着女性仍被视为“生育机器”的残酷现实；蔓延全国的“女德班”和网约车遇害女性遭遇“荡妇羞辱”的网络暴力说明基于男权立场的传统女性规训某种程度上已然内化为后者自我压抑的充分理由；购物网站目标明确的穿搭“好嫁风”显示出消费主义裹挟父权话语对

女性审美的绝对控制……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塑造而成。^[2]身处晦暗不明的社会空间，今天的中国女性仍然需要不断被发掘、被表达、被看见。

一、横跨两个百年的女性主义思潮

普遍认为，女性主义思潮的第一波肇端于19世纪中后，争取同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乃其核心诉求，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就业问题是三个斗争焦点。政治上，著名活动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堪称这一阶段女性主义思想的集大

于晓风，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影视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余晓琪，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成者。“在合理的政治给我们带来自由的时候，整个人类，包括妇女在内，将变得更聪明和更有道德。”^[3]经济上的独立，则诉之于倡导女性在劳动市场上的平等竞争与同工同酬。^[4]

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涌动于20世纪60年代初，主要目标是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虽然经历第一波思潮与运动之后，女性获得了较之以往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空间，但同时也陷入了表面化的泥淖。女性主义思潮的第二波将性别平等难以实质性推进的根源归结于两性差别。因而，消弭差异、使两性趋同就成为了这一阶段的总体基调，并由此衍生出学术领域性别研究的热潮。女性主义运动的旗手西蒙娜·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秉持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立场，鼓励女性超越自我性别，克服女性气质的直觉和感情，成为同男性一样“理性”的“人”。^[5]为此不惜隐藏甚至抹除自我特征，着力彰显强攻击性、充满野心、富有竞争力等男性气质。

事实上，波伏瓦的主张承袭的恰恰是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来西方男权中心主义对于“理性人”的理解——“妇女并非生而缺失理性……只是潜在理性没有得到开发。”^[6]这也为其基于使女性成为“与男性同样完整的人”^[7]这一目标而展开的“理性培育计划”招致了非议。政治理论家埃尔西坦(Jean Bethke Elshtain)就将这一论调视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馈赠给男性价值的“超值大奖”，并尖锐地指出，这种把男性等同于人类、把男人的“美德”等同于人类美德的做法，显然是错的。^[8]

第三波女性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末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的合力激发。一方面，互联网提供的海量信息与传播赋权实现了媒介自主，技术的进步使人摆脱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为女性主义思想实践和女权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更为优良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全球化趋势客观上加剧了不同文明间的流动，多元文化交融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更为开阔的内生视角。而生态意识的觉醒则令环境被愈加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随之被重新审视。抗争中，自然与女性归入同一阵营，向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话语齐声诘问，进而将所有遭受二元压迫的边缘群体统统纳入麾下。

生态女性主义恰在此时横空出世，成为第三波女性主义思潮对这个世界最为响亮的回应。

生态女性主义自诞生之初，即被视为女性主义的未来与希望。由之引发的思想震撼，堪称妇女运动抑或女性主义策略的“第三次浪潮”^[9]。生态女性主义重点探讨女性与自然的关切，强调主体的意义和价值，批判二元对立的统治逻辑、父权专制和理性主义，将女性与其他因阶级、种族、地理、文化等差异分隔开来却同处“被建构”地位的他者有机且紧密地整合为一个强有力的联盟。情感体验作为主体认知的重要过程，以关怀的方式表达对他人、动物及自然世界的肯定与尊重，被生态女性主义置于与理性判断同等重要的认识论高度。经由主体间情感的共享、共情和共鸣，双方的价值及需求方能得到关注、理解与尊重。

二、自我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的双向互动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探讨是认识论的核心议题。区别于前两个阶段对自我诉求的单向注重，以生态女性主义为标志的第三波女性主义思潮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将关注投向了自身以外的他者。这种关注并非简单地呼吁，而是要求沉浸式体验，将自我置身更为广阔的自然，感受与身处“对立面”他者的沟通障碍、误解根源和冲突逻辑，发掘身处“相似位”他者的痛苦来源和不幸造就，最终的目标不是消除对立，而是努力寻求主体自身的深度清醒，多元立场的了解认同，以及差异观念的最大包容。

(一) 主体清醒

感知的主体清醒，指个体基于外部刺激或内省反思，主动审视自我价值意义之后的主体意识觉醒。任何社会正义的实现，都要以主体的意识觉醒为前提。今天的女性越来越期待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一美好生活与自身、他者和整个世界息息相关。在“什么对象应该纳入不被歧视的正义讨论”追问之下，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话语这类原有的确定正义主体的规则，可能本身就包含歧视和非正义，从而导致泛化偏

见。而偏见乃是持有者、对象和旁观者等多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建构的社会心理现象。^[10]因此,全球化时代依然未能摆脱非正义歧视的女性,就面临两大主体认知层面的当务之急:其一,体认自我在歧视环境下作为偏见“对象”或“旁观者”的主体身份;其二,将性别歧视批判纳入生态文明社会正义的范畴,寻求更为开阔的主体身份认同边界。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摒弃了男性“理性而完整的人”的立场,拥抱一切被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规定为“他者”的边缘群体——动物、自然,将挑战和反抗从父权话语延伸至人类中心主义。

(二)多元认同

观念的多元认同,倾向多样性和不同间的混杂与离散,“强调我/他之间没有绝对的边界”^[11],反对二元论逻辑及其对“他者”的僵化规定,表现为批判单一权威和鼓励文化流动。一方面,男性赋予自身的价值为“1”,而规定包括女性在内的一众他者的价值皆为“0”。唯有依附于男性话语之下,“1”之后的“0”的存在才有意义。据此进一步推理,男性便可唤起“法律”、“规则”和“永恒”,并与“积极”、“良好”、“光明”、“秩序”等理性的代名词紧密相连。而女性作为对立面,则意味着“混乱”和“不可预测”。^[12]二元论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否定或他者概念,摆脱的恰切方式,唯有动用非等级化的差异取而代之。^[13]生态女性主义对其的批判,正是着眼于统治逻辑的等级设置,鼓励多元话语参与叙事,从而解构男性话语的单一权威立场。另一方面,文化史上自我与他者的对立西方由来已久,时至今日依然潜在于群体身份之中,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将文化进行静态条块分割,并固执于“边界”的不可逾越。伴随西方哲学史对“他者”独立地位的恢复,女性开始重新思考自我,着力寻求在地发展的更多可能。事实上,无论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她”,都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空间,面对文化和文明,实则呈现与传承。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化二元对立为相互渗透,在“自我”和“他者”之间进行主动性延异,将身份建构为流动的多元混合,力图化解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的冲突和障碍。

(三)差异包容

态度的差异包容,指向文化观的宽容与博爱,发展观的共生与共荣,遵循自我—他者、人类社会—自然系统之差异耦合,关注全球化与在地性的流动进展,内蕴着深度的情感温暖与善意。由于依赖的加深,“差异”成为全球化时代极具潜力和价值的文化资源,欣赏、尊重和主动理解则是其现实保障。与此同时,全球化语境下的“边界”早已突破了政治权力和国家历史的象征,显示出更为鲜明的流动性。^[14]经济的迅速发展引发全球范围大规模的城乡巨变和社会转型,环境和文化领域的冲突不可避免。空间和地理思维对性别歧视的影响日益可见。今天的女性抗争,很大程度上已划归为追求宽容以待和自我控制的全部努力。正是在这一立场上,生态女性主义力主对差异和不同的兼收并蓄,拒斥狭隘的男权主义、民族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怀抱一腔热忱,始终对他者保持以尊重为前提的好奇、以平等为前提的开放和以关怀为前提的包容,无论认知惯习还是生活方式上的“独特”,都被视为尊重与珍视的“值得”。借助“情境普遍性(Situated Universalism)”^[15],生态女性主义脱离了浑身是刺、张牙舞爪的表达,得以在不同的道德共识和价值选择之间,展开冷静而客观的思辨、沟通与共享。而从具体生活情境性出发,由衷推崇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人与自然的差异性存在的起点,恰恰是对多元价值虚怀若谷的开放与充满善意的包容。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女性主义并非简单的田野调查、社会剖析或前沿思考,而是在体验中不断调整、修正、更新对于自我和他者关系的认知,尝试通过观察整理二者情感互动的进路,对比过程中力量的强弱变化,概括不同阶段二者各自存在,以及对于对方和环境的意义和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对双方的需求进行合理化解释,最终阐明彼此关注、理解与尊重的必要与可行,并努力给出可供操作的解决方案。这一第三波女性主义思潮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贡献,可谓历经百年发展的女性主义逐渐跳脱认识论思维,转向方法论探索的醒目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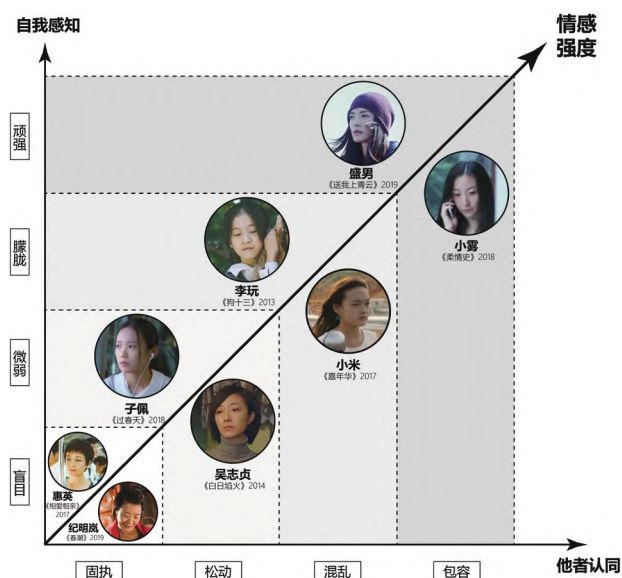


图1 上升曲线示意图

三、双向互动的多元呈现：以女性为视角的新时期中国电影

中国电影敏锐把握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诉求，在创作中努力尝试对自我与他者的双向互动以及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关系变化、方法调试和认知发展进行各个维度的多元呈现。近十年来，以情感体验为特征的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电影的女性人物表达上总体呈现为两条脉络：自我感知和他者认同。前者通过女性自我审视的困顿、迷茫与坚定，描摹出日渐清晰的过程；后者则通过面对环境的孤独、无措和善意，呼唤着他者对于女性对象的深层体验与多元感受。二者分别按照各自的进路成长，在“情感强度”的统摄之下，多种组合效果各异，借助女性视角勾勒出一条上升曲线（如图1）。

（一）盲目的主体感知与固执的一元认同

《相爱相亲》（*Love Education*, 2017, 张艾嘉）中的慧英与《春潮》（*Spring Tide*, 2019, 杨荔钠）里的纪明岚主体感知过分盲目，价值选择执着而固守。

慧英自豪于自己“一家之主”的地位。她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摆放“家”的装饰，时刻彰显家庭内部的话语权威，就连提器挖坟也一马当先，走在一众男

性的最前头。与此同时，精湛的厨艺和熟谙的家务，以及年轻时留给丈夫腼腆保守的深刻印象，暗示着慧英内心深处固守着父权话语下的“妻子”身份及其对于传统女德规训的恪守。在一元价值观的统摄下，整部影片的线索“迁坟合葬”成为其意在满足一厢情愿的“父母爱情”想象而上演的一出现实闹剧。纪明岚则得意于其家庭以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在家庭内部，她无法接受作为女人婚姻的不如意，为此不惜撒了一辈子诬陷前夫的弥天大谎，并一边把所有愤怒发泄在女儿身上，一边仍自以为是、一厢情愿地为女儿着想，实施对后者的绝对统治。纪明岚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同样坚不可摧，其对女儿人生的左右弥漫着浓重的二元对立意味。

慧英与纪明岚追求的是拥有家庭空间的绝对话语权，但这“绝对”却因为过分盲目而外强中干，奋力争取来的“自我”实则沦为他者的附庸。诚如慧英多次叹惋未能生出儿子的遗憾；诚如纪明岚屡屡执着于为明显应付的女儿寻觅如意郎君。过分盲目的主体感知背后，仍然是一元统治逻辑及其织就的二元对立关系，不过她们用生猛的外表自我蒙蔽了而已。正是对一元价值的固守和对多元价值的排斥，成为最终制约慧英和纪明岚走出意识困局、破解人生窘境深层原因。

（二）微弱的主体感知与松动的一元认同

《白日焰火》（*Black Coal, Thin Ice*, 2014, 刁亦男）中的吴志贞和《过春天》（*The Crossing*, 2018, 白雪）里的子佩身上的主体感知相对微弱，价值观却已不再执拗，显示出一元论暗地溃散的松动倾向。

吴志贞在丈夫“死”后，选择了固守与等待。她将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命附着于丈夫罪恶的背负上，无论工作还是感情，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周遭男性的同情、怜悯、馈赠和施舍，初初萌动的觉醒停留在欲望长期压抑下的反抗，然而这种反抗却毫不留情地将之引向死亡。相较于吴志贞的被动，子佩的身份认同则更多是潜意识层面的卑微。一张证件既不能弥合文化语境的差异，也无法掩饰“单非”（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内地人，户籍在香港，居住在内地）身份的尴

尬,唯一能做的就是夹缝中苟且偷生:融入同学的途径是手机贴膜,享受父爱的条件是远赴货场,自我独立的代价是违法走私。两个形象身上,“他者化”的记忆已经内化为深刻的自我身份认同,差别仅仅在于吴志贞诉诸情爱,子佩寻求梦想。但是,无论被动还是主动,自我感知的脆弱乏力都令她们的存在微弱到形同于无。

与此同时,一元价值的动摇也显而易见。吴志贞对张自力的倾心彰显着自我的放纵,子佩深埋的旅行梦和甘于牺牲的挺身而出昭示着内心的执着。她们是幸福的——冲破固有惯习的框范固然艰难,却终究在情感上获得了前所未有而充实饱满的体验。她们也是痛苦的——主体感知在习惯被打破之后势必天翻地覆,诚如吴志贞只能留下白日焰火作为爱情的祭奠,诚如子佩最为感同身受的还是那条关在鱼缸里的鲨鱼。松动的一元价值仍然不是女性自我救赎的正解。

(三) 朦胧的主体感知与混乱的多元认同

《狗十三》(*Einstein & Einstein*, 2013, 曹保平)中的李玩与《嘉年华》(*Angels Wear White*, 2017, 文晏)中的小米主体意识模糊,情感感知朦胧,价值的多元认同建立在难以取舍的混乱体验之间。

李玩在父母离婚后被寄养在祖父母家里,流放于规范的成长环境之外。其主体的朦胧感知体现于三个层次的混乱。首先,作为身份识别的名,“玩”字起得任性而随意,对照异母幼弟以“昭”为名的隆重而正式,尤其凄凉。其次,作为权威话语的父亲,给出了自相矛盾的价值判断。无关紧要的时日品德操守严禁她沾染酒精,虚与委蛇的酒场却为谋利讨好鼓励她放胆去喝。最后,作为精神寄托的爱好,真假一再错落。意外惊喜的礼物——溜冰鞋源自培养幼弟的顺手牵羊。孤独心灵的唯一伙伴——宠物狗走失之后可以轻而易举地张冠李戴。小米对于自我的朦胧感知则是基于身份的无处安放。“黑户”的限制使她的生活没有保障,游走在城市边缘,“三年换过15个地方”。初次介入犯罪现场的她,基于善良的直觉保留了证据;而后又为办假身份证将证据用来要挟罪犯,并且因为不想惹祸上身而刻意藏匿,沦为帮凶;直到同样遭受

欺骗和伤害之后,才选择站在了正义一方。

主体感知的模棱两可导致价值选择的左右为难。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多元价值并非破釜沉舟的去处,反倒充斥着举棋不定的犹疑。李玩眼中,父亲既是家庭内部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又是自己面前卑微愧疚的赎罪者;异母幼弟既是争夺爱护资源的竞争者,又是释放关怀情绪的接收者;宠物狗既是自己不被理解的现实境遇的同情者,又是自己无足轻重的身份地位的救赎者……小米面前,“参与者”的自我奉行“帮助别人不如给钱来得更有意义”的逻辑;“旁观者”的自我遵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规范;“受害者”的自我秉持“感同身受,伸张正义”的原则……无论哪个身份,都令她们无法抗拒,亦无从逃脱,辗转反侧之余,只能做出态度暧昧、来者不拒的选择。

怀抱多元价值却认同混乱的李玩和小米,因为主体感知的朦胧,结局的洒脱终究只能浮于浅表。李玩曾经展开数度反抗——疯狂寻找走失的狗,残忍丢弃家人以慰安抚的替代品,但最后还是扼杀自我的童真,回归他者眼中成熟懂事的大人。小米则在历经良心的挣扎、金钱的诱惑、无知的嘲弄和卑微的生命最为残酷的蹂躏之后,冲出逼仄的裹挟,踏上生命中第16段征程,依然做着无处安身的流民。

(四) 顽强的主体感知与包容的多元认同

《柔情史》(*Girls Always Happy*, 2018, 杨明明)中的小雾和《送我上青云》(*Send Me to the Clouds*, 2019, 滕丛丛)中的盛男显然已经脱离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她们的主体感知深沉而强烈,自我的顽强毫不减损对“不相干”和“不相同”的尊重,展现着宽厚包容的多元价值认同。

小雾是个身在京城的大龄未婚文艺青年。没有房子、固定收入、婚姻……这些世俗层面极具杀伤力的字眼儿丝毫不能阻挡她对于惬意生活的信仰,赖以谋生的剧本创作也不能放下品味随便屈从市场需求,就连长久以来单亲家庭的相依为命也无法终止她与母亲势同水火的相爱相杀。盛男的挣扎源自她要的“体面”。父亲出轨,母亲无知,自己单身还被查出卵巢癌,要把救命的钱挣了,就得舍下脸,放低身段,向原本

最不屑的活计、最瞧不上的人低下高贵的头颅。面对这个并不慈悲的世界，柔弱而渺小的她们不屈不挠，不卑不亢，锲而不舍。

保有顽强主体感知的同时，她们也在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向世界敞开胸怀，努力对话。小雾并不擅长与人相处，但她艰难地走进男友的交际圈，尝试写出适销对路的“抗日神剧”，认真地感受母亲年深日久的焦虑，然后放低自己，接受已然老去且无法改变的母亲，从餐桌礼仪到市井砍价，主动迎合其趣味和习惯，只为使妈妈有陪伴，不孤单。盛男的成长经历和不幸遭遇使她对二元话语天然排斥。感受到母亲的幼稚无力，她既厌恶又保护；沉浸于异性的相濡以沫，她既霸道又珍惜；体会到伪君子的虚情假意，她既享受又鄙视；置身于恶疾的突如其来，她既恐惧又担当。二者的多元价值，建立在真诚的体认，由衷的尊重与清醒的判断之下。

顽强，洋溢着冒险的精神和不服输的勇气。包容，并非泯灭个性的顽强。小雾和盛男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提醒着自己与血缘上最为亲密的他者——母亲的差异，但是，她们对于个性的坚持并没有导向一意孤行的偏执，而是思考之后，转过身，理解和拥抱了母

亲——这，才是对于多元价值最为智慧而伟大的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小雾骑着单车招摇过市于狭窄的胡同，还是盛男站上城墙与疯子共同呐喊，都显得那么美好。

结语

生态文明时代召唤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破题的关键在于建构主体与他者的良性互动关系。生态女性主义给出了情感体验的提示。按图索骥，步入新时期的中国电影交出了女性表达的生动答卷。这是第三波女性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艺术实践，也是中国电影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努力与结晶。

愿你我俯下身，细看沿途被忽略的风景，聆听耳畔不一样的声音，呼吸日常遗忘掉的气息，感受身边最熟悉的她/他/它们。于是，乘着微光，踏月而来，爱，已是多重含义。▲

注：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中国生态电影创作与传播策略研究”（17CQXJ29）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董馨蔚）

注释：

- [1] “女性是一束光”作为理念，2018年由《人物》和《每日人物》主办的“她面孔·年度女性力量盛典”首度提出。参见陈墨：她们从不愿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EB/OL].https://mp.weixin.qq.com/s/mADXofdYvSx0yN97_S8slQ,2019-6-6.
- [2]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 I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4.
- [3] (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著·王蓁等译·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2.
- [4] 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9-20.
- [5]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 II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572-579.
- [6] 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5，39.
- [7] 陈英·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2.
- [8] Jean Bethke Elshtain,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Wome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201-297.

- [9] 陈英·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2.
- [10] Kenneth J. Gergen, *Relational Being: beyond Self and Communi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9:51.
- [11] 卢梅芬·从展示文本迈向我群与他者的沟通[J].博物馆季刊，2015，29(3)：15.
- [12] Ariel Salleh, *Ecofeminism as Politics: Nature, Marx and the Postmodern*[M].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Ltd., 1997:36.
- [13] (澳)薇尔·普鲁姆德·马天杰等译·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50.
- [14] Randy William Widdis, Crossing an Intellectual and Geographic Border[J].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010, 34(4):445-497.
- [15] 指个体在共享的社会情境中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共识。参见 Karen J. Warren,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114.